



暨南大学中文系“国家文科基地”系列教材

文化哲学导论

杨启光◎编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暨南大学中文系“国家文科基地”系列教材●

文化哲学导论

杨启光 编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9年·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哲学导论/杨启光编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9. 8

ISBN 7-81029-767-8

- I . 文...
- II . 杨...
- III . 文化理论
- IV . G02

文化哲学导论
杨启光编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排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 经销
南海市彩印制本厂印刷
1999年8月第1版 1999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25
字数: 44.5 千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28.00 元

自序

暨南大学中文系担负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心”的建设任务，教材建设是其中的重要一项。为此，中文系制定了“文科基地教材编写和出版规划”，同时将能够贯通文史哲的基础理论教材作为首选之一，以致这部历经近十年编撰和修订的《文化哲学导论》有幸得以付梓。本人治学二十载，发表过近百篇论文，主编过论文集，参编过辞书、教材和专著，但作为独立编撰的书，这是第一部，且“完成”于“知天命”之际。因此，有必要交代其编撰的背景、缘由、经过、取材和旨趣等。

80年代初的中国，由检讨“文化大革命”的引发，全国掀起了对中国百年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文化反思。于是，“文化研究”在停滞了数十年之后转而兴盛起来。在这股“文化热”的带动下，同时也是在中国百年语言学学术机制的运作下，80年代中叶，中国语言学界兴起了一股文化语言学思潮。其中，“文化认同”派高举“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旗帜，自觉立足于中华文化本体上，坚持汉语汉字的本体研究，贯彻中西文化、中西语文学的“对等比较”原则，提出了“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包括语言文字），必须以中国文化为本体，吸收融合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的命题，展现了新一代的中国语言学学者检讨、反省中华文化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视野和新视角，表达了他们立志以“多元文化”论实现中华文化现代化转型的民族自信心，在当时“言必称希腊”的沉闷学术气氛中，注入了一股对于民族文化有着高度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的文化自觉意识，从文化的各个

层面和层次，特别是文化的“深层结构”上，挑战了“全盘西化”论的学术心理定势，从而酿成了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十年论辩。中国文化语言学的“语言文化通观”、“汉语人文性论”及其“认同中华文化”的方法论原则，不仅触及汉语汉字与中华文化的关系问题，而且涉及了中西（外）文化观及其交流问题，还涉及到中华文化今后的发展路向及其如何完成现代化转型的问题。因此，中国文化语言学自建构之日起，其影响就不再局限在语言学之内而遍及神州、扩及海外。

本人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进入高等学府的高中“老三届”，作为1978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和1983级的现代汉语专业硕士生，正是伴随着这一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论辩，迈进了中国百年语言学和西方现代语言学之殿堂，了解了中国百年语言学与西方现代语言学的渊源关系以及中国百年语言学的症结所在——在“全盘西化”论的指导下，对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盲目文化认同和对中国传统语文学的彻底文化决裂。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百年语言学确实在形式化、系统化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然而却是在西方语言学后面的亦步亦趋，“始终不能彻底地创立中国的风格”（引自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5页），因为它在许多领域，特别是语法学、汉字学以及语言理论等，既不能有效地承继和发展中国传统语文学的丰厚成果，又无法获得民族文化的哲学依托和民族语言的心理支撑。鉴于此，本人自硕士论文《现代汉语多项NP句探析》的研究和写作开始，就以“为中华文化的复兴而研究汉语汉字”为治学宗旨、以“揭示汉语汉字结构之文化内涵”为治学目标，将汉语语法研究与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汉民族的思维方式、语言心理、语文感受等——联系起来，对开展汉语语法的文化学研究作了一次成功的尝试。从此，一发而不能收——逼迫本人在后来的教学科研中必须将治学之初那种“为汉语汉字而治汉

语汉字”、“就汉语汉字而论汉语汉字”的旨趣和目的彻底扬弃，从而确立“为中华文化的复兴而研究汉语汉字”、“努力揭示汉语汉字结构之文化内涵”的治学宗旨和目标；逼迫本人必须坚持立足在汉语汉字本体研究的基础上，努力将视野扩及到汉语汉字所“安身立命”的中华文化上。这样，“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中华文化”的课题，很自然地，就摆到了本人的治学日程上。于是，在坚持汉语汉字本体研究的同时，一面大量研读文化学书籍，一面参加了1987年5月至1989年5月中国文化学院“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函授）”的学习。从此，本人由语言学殿堂步入文化学殿堂，并努力将二者贯通起来。此举，既进一步开拓了本人的语言文化视界，又更加坚定了既定的治学宗旨和目标，进而逼迫本人只能继续在坚持汉语汉字本体研究的同时，强化文化的研究。

为了强化文化研究，本人遵循“教学相长”的古训，以研究生阶段的专业学习和中国文化书院的函授学习之所得为本，1989年便为中文系、历史系、新闻系等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开设了选修课《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导论》，同时充分利用了教学反馈信息来深化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在这一过程中，本人越来越强烈地感到，中西文化的比较能否有效，关键是持何种中华文化观、西方文化观以及比较方法是否得当的问题；与此同时，随着语言与文化关系讨论的深入以及汉语汉字文化学研究的展开，文化理论的系统学习和研究，便又被提到本人的治学日程上来。于是，本人所阅读的文化学书籍，也就由一般的文化比较类、文化史综述类转向了文化理论类。当时，除了大量阅读了西方的文化理论书籍外，还特别钟情于中国学者，尤其当代中国中青年学者所撰写的文化理论书籍。其中，在理论旨趣和理论架构上对本人影响最深的，便是许苏民先生的《文化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这部著作的观点，本人不尽同意，但它在评介西方

文化哲学以及力求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上，却确确实实地将本人的文化视野提高到了哲理的高度，从而，促使本人注意到并努力克服前一阶段文化研究中那种“就文化现象论文化现象”的肤浅，同时逼迫本人以一种文化的视角重读了一些中外哲学名著，特别是中国哲学史专著，如：张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契先生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肖蘧父、李锦全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等。为了强化自身的文化理论研究，提高文化研究的理论层次，本人依然遵循“教学相长”的古训，以《文化哲学》为底本，于1991年开设了选修课《文化哲学导论》，迄今已讲授了四次。在这期间，本人既以教学的反馈信息为动力，又以文化研究的新成果为养料，不断地修订和扩充讲义，时至今日，这部《文化哲学导论》的编著，为了教学的急需，总算“完成”。

本人深知，以自身的学力、水平，是无法胜任建构“包罗万象”、“钩沉探赜”的文化哲学教材的。这部《文化哲学导论》，可以这么说，只是以反对“全盘西化论”倡导“文化多元论”为纲领，以阐释语言文化的互渗关系为核心，以探寻治学的文化学方法为旨趣，将诸多前贤时秀的文化研究成果、哲学研究成果和语言研究成果，进行一种“文化哲学”的审察和编纂。因此，全书除采用本人的某些研究所得之外，大量的是对所引用和评述的他人研究成果进行一种“文化哲学”的语言解读。鉴于此，为了不掠人之美，凡引用的材料、观点等都予以尽量详尽的注释，同时将本书定位为“编著”。即使如此，要准确引用、评述、解读他人的研究成果，并非易事，误读实在难免。对此，概由本人负责，与原作者无关，同时竭诚欢迎批评指正，以求抛砖引玉。

目 录

自 序	(1)
绪 论	(1)
第一章 文化定义论	(19)
第一节 对以往文化观念或定义的批判考察	(20)
一、“文化”词源学的意义	(20)
二、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观念	(21)
三、法国启蒙者和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文化观念 ..	(22)
四、现代西方文化哲学的文化观念	(23)
五、文化人类学的文化定义	(23)
六、苏联学者的文化定义	(24)
七、马列经典作家对“文化”一词的使用	(25)
第二节 确立准确的文化定义和完备的文化观念的原则	(28)
第三节 文化哲学对文化的探索及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文化定义	(32)
第二章 文化发生论	(45)
第一节 对以往文化发生说的批判考察	(45)
一、神创说和圣创说	(46)
二、模仿自然说	(48)
三、人类自身匮乏说	(50)
四、自然发生说	(51)
五、人类本质说	(58)
第二节 文化发生：人的类本质的形成和体现	(63)

第三节	文化发生的精神、心理机制	(75)
第四节	文化发生与自然地理环境	(97)
第三章	文化结构论	(112)
第一节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	(113)
一、	物质文化	(113)
二、	制度文化	(116)
三、	精神文化	(120)
第二节	文化心理的表层结构、中层结构和深层结构	
		(125)
一、	文化心理的表层结构	(126)
二、	文化心理的中层结构	(130)
三、	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	(134)
四、	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中层结构 的关系	(136)
第三节	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	(141)
一、	五重现实对象性关系和文化心理深层结构的 基本层次和分析架构	(142)
二、	五重现实对象性关系的特殊性与文化心理深 层结构的民族性	(146)
第四节	主流文化与亚文化	(156)
一、	主流文化	(156)
二、	亚文化	(159)
三、	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关系	(165)
第五节	文化离析与文化整合	(168)
一、	文化离析	(169)
二、	文化整合	(172)
三、	文化离析与文化整合的关系	(176)
第四章	文化层次论	(183)

第一节	本能文化	(184)
一、	饮食文化	(184)
二、	性爱文化	(187)
三、	衣着文化	(188)
四、	居室文化	(188)
五、	保健文化	(189)
第二节	自由文化	(191)
一、	真	(193)
二、	善	(200)
三、	美	(208)
四、	自由文化——“真”、“善”、“美”的有机统一	(214)
第三节	本能文化与自由文化之辩证	(228)
第五章	文化属性论	(232)
第一节	文化的创造性	(232)
第二节	文化的自由性	(234)
第三节	文化的群体性	(239)
一、	文化的阶级性	(240)
二、	文化的民族性	(244)
第四节	文化的时空性	(249)
一、	文化的时代性	(249)
二、	文化的区域性	(254)
第五节	文化的开放性	(261)
第六节	文化的民族性与文化的时代性之辩证	(266)
第六章	文化发展论	(272)
第一节	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272)
一、	科学—理性思潮的文化发展观和新康德主义	
	文化哲学的文化发展观述评	(273)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观的阐释	(277)
第二节 变异和传承的辩证：文化发展的运动形态	(284)
一、文化变异	(284)
二、文化传承	(287)
三、文化变异和文化传承的对立统一	(290)
第三节 民族文化心理的变异与传承	(293)
第四节 文化心理的凝结沉淀与氤氲化生	(309)
一、文化心理的凝结沉淀	(310)
二、文化心理的氤氲化生	(313)
三、文化心理凝结沉淀与氤氲化生之辩证统一	(318)
四、社会文化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	(320)
第五节 文化发展的衡量尺度	(322)
一、文化发展：历史的与道德的、科学的与伦理的悲剧式冲突结果	(322)
二、理解、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发展衡量尺度	(327)
第七章 文化动因论	(335)
第一节 文化创造的永不止息	(335)
一、文化创造：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奇妙结合	(335)
二、对需要的永不满足：文化创造的动力之一	(338)
三、对现状的永不如意：文化创造的动力之二	(341)
第二节 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与深入	(344)
一、文化隔离：一种“反文化”的文化现象	(344)

二、文化交流：冲破文化隔离的手段和结果	(348)
三、交流方式：和平的与血火的	(351)
四、交流机制：“本族化”和“不失真”的矛盾 运动	(353)
第三节 由文化反省达到文化自觉	(359)
一、文化反省：特定时代的文化自我批判	(360)
二、文化自觉：特定时代的文化自我觉醒	(366)
三、由反省到自觉：旧文化的终结和新文化的崛起	(369)
第四节 中国的现代化：对中华文化本体反省和自觉 的不断扩大和深入	(376)
第八章 文化学方法论	(406)
第一节 由科学主义到人文主义：文化学方法 产生的背景	(406)
第二节 由政治视角到文化视角：中国学术文化学 方法转换的关键	(434)
第三节 认同中华文化：中国学术的文化学方法论原则	(447)
一、文化镜象法	(449)
二、文化参照法	(450)
三、常态分析法	(451)
四、多元解析法	(453)
五、心理分析法	(454)
六、异文化范畴借鉴法	(456)
七、比较求异法	(457)
八、“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法	(459)
九、思维认同法	(461)
十、传统阐释法	(463)

- 【附录一】 先秦“天人合一”观述评 (472)
- 【附录二】 印尼华人研究的一种方法 (517)
- 【附录三】 开阔的视野，诱人的领域——葛劳婷·苏尔梦
的印尼华人文化学研究评述 (526)

绪 论

“哲学”作为一个高高地悬浮在茫茫苍穹中的思想，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反映着时代思潮变迁的最内在的本质；“文化”作为一个深深地沉积在世间精灵即“人”中的类本质，作为时代风貌的镜象，反映着时代思潮变迁的最本质的内在；二者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汇集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文化哲学”潮流，成为走向21世纪的世界哲学和世界学术的主潮。

在第16届世界哲学会议上，当人们还把注意力集中在解决新兴科学所提出的哲学问题上并把科学哲学问题作为会议兴奋点时，谁能料想到，这却是从16世纪开始绵延了三百余年的“经验—理性”的科学主义主潮所发出的最后的耀眼闪光而已。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斯德哥尔摩国际社会学年会把文明选择的尺度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世界性课题，伴随着涉及政治、历史、社会等多学科的“韦伯热”在欧洲的兴起，1984年在罗马尼亚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会议闭幕词明确宣布：当代世界哲学的重点已经从科学哲学转向文化哲学，世界哲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次巨大的历史性转折。

世界哲学主潮的这种历史性转折，除了哲学自身内部的学术运作机制的结果外，还基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在自然科学方面，由20世纪“物理学革命”所导致的对自然科学中主体性因素的肯定和重视，突显了“人”在了解自然、把握自然、改造自然中的主导地位和辩证作用，而作为对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一种反思和补偿，关于人类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即“文化学”在世界范围内蔚为壮观；^①在人文

科学方面，19世纪后期产生的人类学、地理学和东方学的研究则日益显得与“经验—理性”的科学主义思潮“格格不入”，1945年以后历史学与其他社会学科进一步融合以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互渗透，亦导致“文化研究”即“文化学”的兴起并对现存的理论范型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②正是由于上述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合力”，加速了世界哲学由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的转向。

鉴于上述原因，迄今为止，尚被某些学者称为“准学科”的“文化研究”，实际上已经统摄着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同时迫使着人们以“文化研究”的范型来改造发展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既然要以“文化研究”的范型来改造发展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那么弄清什么是“文化研究”、什么是“文化”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前提。因此，在人们力图以“文化研究”来统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同时，也促使人们必须对“文化研究”自身的历史、现状进行研究，对“文化”自身的定义、发生、结构、层次、属性、发展、动因及其研究方法等进行研究。于是，“文化学”应运而生。

现代意义的“文化学”，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中后期的西方。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伏尔泰、蒙田、卢梭、孟德斯鸠等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对有史以来的文化现象进行了初步的探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思想家，则侧重从道德意识、审美意识、宗教意识等角度认识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正是这些法国启蒙思想家、德国古典哲学家对于“文化”的思考、探索，为现代意义的“文化学”奠定了基础。于是，德国学者C. E. 克莱姆发表了《普通文化史》（1843年）和《普通文化学》（1853年），英国学者E. B. 泰勒出版了《原始文化》（1871年）。此后一百多年间，经过弗雷泽、克鲁伯、马林诺夫斯基、汤恩比、斯本格勒、列维—斯特劳斯、本尼迪克特、李凯尔特、卡西尔、关

荣吉等的共同努力,^③“文化学”便蓬勃发展起来，同时构成了前述的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统摄态势。

当然，“文化学”的蓬勃发展及其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统摄态势的形成，除了“文化研究”的人文主义本质及其开阔的学术视野之外，还在于“文化研究”一开始就与哲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构成了所谓的“文化哲学”的思潮。同样地，“哲学”的“文化哲学”思潮由非主潮向主潮的转化，也不是突然在一夜之间完成的。其间，自有其源流。

从源察之，“文化哲学”思潮的产生可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一是其终极根源——近代世界市场以来各民族向现代化迈进的历史；二是其直接来源之一——世界各民族在向现代化迈进的历史运动中所氤氲化生和凝聚沉淀的社会心理或文化心态；三是其直接来源之二——政治、道德、艺术、宗教等意识形态和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东方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可资进一步提炼升华的思想资料和理论启迪。^④

从流审之，“文化哲学”思潮的演进则历经了由维柯、赫尔德、康德到叔本华的萌生期，由新康德主义^⑤到狄尔泰^⑥、尼采^⑦等的生长期；到了20世纪则进入了其结实期。这个时期，在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和弗莱堡学派文化哲学学说的激荡和影响下，各种文化哲学学说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其中有：柏格森的生命冲动的文化哲学、胡塞尔的本质的文化哲学、舍勒尔的情感的文化哲学、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的文化哲学、斯宾格勒与汤因比的历史的文化哲学、杜威的社会的文化哲学、弗洛伊德与荣格的精神分析的文化哲学、弗洛姆的生理心理主义的文化哲学、罗素的知识的文化哲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分析的文化哲学、卡尔纳普的逻辑主义的文化哲学、德日进的整体演化的文化哲学、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的文化哲学、宋巴特的人学的文化哲学、史怀哲的人道主义的文化哲学、索罗金的类型的文化哲

学、斯普兰格的心灵型的文化哲学、怀特海的机体的文化哲学、卡西尔的人类符号的文化哲学，等等。根据这些文化哲学与新康德主义的承继关系，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明显是继承了马堡学派的传统；而柏格森、弗洛伊德、荣格、弗洛姆、斯普兰格等则明显地继承了弗莱堡学派的传统。^⑧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大流派在其演进中却出现了日益靠拢乃至走向融合统一的趋向。这种趋向，一方面表现为理性主义传统的文化哲学受到非理性主义传统的文化哲学的浸染，如：罗素对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相互关联的研究，卡西尔文化哲学“拒斥形而上学”之呼声的逐渐消失；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现代的非理性主义传统的文化哲学流派，开始运用逻辑分析来弥补自身的不足，如：杜威、胡塞尔的文化哲学兼有两派传统的特征，索罗金的文化哲学从整体性出发来说明人的自我创造性是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的统一。后来兴起的结构主义的文化哲学把语言学、精神分析学和文化人类学作为自己的理论来源，亦力图把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统一起来；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则把历史看作是人的本能冲动（“快乐原则”）与科学理性、社会文明（“现实原则”）的冲突史，试图在历史文化的发展中将二者统一起来。此外，舍勒、普列斯纳、兰德曼的文化哲学，其方法更明显地体现为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结合和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融为一体倾向。^⑨

总之，正如许苏民所指出：“（西方）文化哲学业已经历了萌生期和生长期，进入了第三期的发展。第三期是结实期，是形成文化哲学体系的时期。”^⑩因此，有必要对其理论建树及其局限进行系统的考察。

对于西方文化哲学的总体理论建树，许苏民将之概括为：

（西方）现代文化哲学的发展无论在视野上，还是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已向我们展示了它的气象阔